

“一带一路”视野下山西历史文化资源研究

张敬华 / 中国艺术研究院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已沿着通贯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与中国文化碰撞结合、水乳交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回顾历史,山西与“一带一路”有着密切的渊源,自古以来,山西位于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连接地区,是物资交流与文明交汇的重要战略通道,成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节点,明清时期的晋商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五台山的丰富文化遗存,法显的游历与《佛国记》的写作,净土宗的形成与海外传播都离不开这片热土。“一带一路”以贸易往来为核心,文化始终是各国之间沟通与合作的重要着力点,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历史上丝路文化的传播对于构筑“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形成

西汉时,佛教通过官员、商人、僧侣等传入了我国。史载,东汉永平七年(64),东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中一位身長六丈、相貌庄严、金光灿烂的神人在宫殿中飞翔。^[1]后派遣郎中蔡愔、秦景等率众向西求访佛法。^[2]三年后,西访的使臣陪着两位古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回到东汉都城洛阳。二位僧人受到明帝的礼遇,在鸿胪寺驻锡并开始翻译佛经。他们在鸿胪寺合作翻译了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佛说四十二章经》,开创了中国翻译学的先河。因白马驮经有功,故将此处命名为白马寺。自此,佛教受到了朝廷的重视,白马寺成为中国佛教有寺之始,佛学开始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

68年,汉明帝在皇宫召见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僧人。明帝提了一个问题:朕的江山有圣人居住否?二僧引用了释迦牟尼佛《华严经》来回答,“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众

[1] (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四。

[2] 《后汉书·西域传》。

菩萨于中止住。现有菩萨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1]。这里提到的清凉山就是如今的五台山。根据佛经的描述，五台山位于天竺国的东北方，也是皇城洛阳的东北方。明帝听罢立即请二位僧人率人向东北方去找寻。

五台山的东、西、南、北、中五座山峰如擎天柱般拔地崛起，上接苍穹，五峰顶处，有如垒土之台，平坦而无林，与《华严经》记载无二。在巍峨挺拔的五座山峰的怀抱中，还有一座小山峰，又与古印度释迦牟尼佛演教说法的灵鹫山极其神似。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僧人认定这里便是文殊大士演教说法之道场，奏请明帝在这里建寺，以灵鹫寺之名命名。明帝听罢大喜，特意在“灵鹫寺”前添上了“大孚”二字。大孚者，弘信也，大孚灵鹫寺就成为五台山的第一座寺院，唐朝时改称为大华严寺，也就是如今的显通寺。它是中国人严格按照佛教的规制，用自己勤劳与智慧的双手，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从此，五台山逐渐成为僧人驻锡修行、翻译佛经、研习佛法之所，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和高僧大德，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

古丝绸之路以经济贸易为核心，文化始终是沟通与合作的着力点，而佛教文化则是古代丝绸之路发展的助推器。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佛教传播，就没有河西走廊的开拓，在这个过程中，五台山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天竺、尼泊尔、斯里兰卡、韩国、日本等国的僧人到五台山研学佛法。有些僧人回国后，出于对五台山的敬仰，在本国修建了以“五台山”命名的寺庙。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五台山保存了世界上鲜有的古建筑群、佛教造像群、独特的佛教音乐，被誉为“文殊信仰中心”“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宝库”，积淀了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一带一路”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商贸交流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作为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友好交流的象征人物，法显大师不仅是一位满腔热忱的求法比丘，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人类宗教史上至心虔诚的精神传教士，被喻为“中国西行求法第一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舍身西行、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他们所到达之处距离中原十分遥远。260年，三国时期的僧人朱

[1] 《大方广佛华严经·菩萨住品》。

士行沿古丝绸之路西行求取《大品经》原本，曾到达于阗国，是我国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玄奘法师历经 17 年西行求法的壮举，始于 627 年，晚于法显之后 200 多年。东晋时期的法显不仅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更是伟大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人文、地理、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记录，对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法显（334—420），俗姓龚，山西平阳人。在他所处的东晋时期，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已经 300 多年，已经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被国人广为接受。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共建寺 1768 所。出家僧人与僧尼数量与日俱增，且名僧辈出。从印度和西域来的高僧人数也出现显著的增长。^[1]问题在于佛经由外进入的比较多，而戒律却少，寺院管理、僧众的约束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65 岁的法显毅然决定前往古印度求取真经。东晋隆安三年（399），法显携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僧人结伴而行，从长安出发西行至张掖，又遇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僧人愿意同行求法。法显一行沿着丝绸之路过敦煌，渡流沙，过雪山，逾葱岭，经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恒河中下游的广阔地区，徒步数万里，九死一生到达古印度，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寻求戒律、参拜各地佛教圣迹，包括释迦牟尼佛诞生地以及佛教传法的圣地和恒河中下游广阔地区的诸国，历经千难万险，抄得大量经典，对沿途的社会、人文、地理、寺院等情况做了大量的宝贵记录。

410 年，法显决定从海路回国，他只身搭乘商船离开古印度多摩梨帝国^[2]，经过 14 天的生死颠簸，数度死里逃生，艰难地到达斯里兰卡的首都——“王都”^[3]。据斯里兰卡历史记载，当时是摩诃那摩国王统治时期。法显在斯里兰卡求法两年，详细地对斯里兰卡的地理、环境、物产、传说、气候和佛教盛行情况等做了详细的记载，并同他的参访求法活动过程一起记录在他撰写的《佛国记》中。这些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直到现在，法显求法的事迹依然在斯里兰卡广泛流传，他的经历甚至被编入斯里兰卡的小学课本中。他所游历、朝拜过的圣山无畏山以南，坐落着由中国援建的“无畏山寺博物馆”，也称为“法显博物馆”，山上至今还留存当年他曾休息的山洞，当地人称为“法显洞”，山下有一座寺院，是法显洞佛学院所在地。山脚有一块巨石——“法显石”，石面上“法显洞”三字用僧伽罗文、中文和英文书写。山脚的一个村庄称为“法显村”，是法显当年从阿努拉达

[1]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 574—580 页。

[2] 古国名。故地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的塔姆卢附近。古时位于恒河入海口，为印度东部重要港口所在。

[3] 今斯里兰卡北中央省的阿努拉德普勒。

普拉前往亚当峰途中曾居住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僧人和中斯两国的传统友谊，法显村于1981年更名为友谊村。村中的寺庙称为“法显庙”，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还曾专程到此拜访。至今，斯里兰卡人民仍然怀念和敬仰这位为中斯友好做出巨大贡献的使者，他们不断地来到中国，来到山西进行参访和交流。2016年6月27日，中斯各界人士又聚五台山纪念法显大师，共叙中斯友谊，法显成为我国和山西对外开放的友谊之桥。

中国高僧法显大师的求法之举推动了中斯两国的文化交往。法显在斯里兰卡除了求取佛典外，还将中国文化、山西地方风俗传播到了斯里兰卡。据文献记载，受法显大师的影响，摩诃那摩国王于428年派遣一个使团前往中国，两国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据载，摩诃那摩国王曾送给中国皇帝两块平纹布，这在当时是斯里兰卡的珍贵特产。摩诃那摩国王还送给中国宝贵的佛牙寺的佛牙复制品。在摩诃那摩国王统治晚期，他还派两个比丘尼使团到访中国，在中国创建了比丘尼戒。

法显远在国外之时，非常思念家乡。据《佛国记》记载：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忽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他曾在斯里兰卡的佛殿中，看到佛像前的供养物中有来自中国山西的扇子，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思念祖国，思念家乡，又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决定回国。东晋义熙八年（412），法显离开斯里兰卡，经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或爪哇），历经千难万险，在山东崂山登岸回到中国，从65岁西行求法历时15载回国，此时法显已是耄耋之年，可想法显此行是何等的不易！他于次年到达京都建康^[1]，不顾年迈，在道场寺与古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共同翻译他带回的佛典，前后共译出弥足珍贵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杂阿毗昙心论》等，共计百万余字。他翻译的《摩诃僧祇律》也被称为大众律，为中国佛教重要的戒律之一，对后世中国佛教律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显对佛经的翻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圆融。

佛学的传入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曾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伴随着佛学而来的还有天文、医学等科学技术。许多中、印高僧大德在翻译梵文和巴利文佛典的过程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造、丰富了中国的语言词汇，比如禅、劫、世界、众生、因缘、果报、功德、刹那、真谛、觉悟、慈悲、执着、自觉、赞叹、般若、功课、色空不二、清规戒律、天

[1] 今南京。

花乱坠、心领神会、庄严国土、三千大千世界、十八层地狱、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等。法显在中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开放中起到了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

法显西行求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撰写了《佛国记》，全文九千五百多字，记录了他西行求法途中西域各国、古印度诸国、南洋等国的历史风貌与风土民俗，历史沧桑变化，许多国家或仅存遗迹，或历史文献资料空缺，法显的记录补充了历史的空白。其对中国法显崇敬不已。

西域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湮灭已久，资料少存，《佛国记》的记载弥补了史书文献的不足。法显至古印度之时，正是古印度笈多王朝（320—480）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繁荣时代，古印度关于笈多王朝超日王时代的历史没有系统的文献记录，法显的《佛国记》对于这段历史却做了详细、珍贵的记载。这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古印度的佛教圣迹、僧侣生活、当时佛教流行的盛况，经常被佛学翻译家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不仅如此，《佛国记》还对地域广阔的中亚、古印度、南亚约三十个国家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做了宝贵的客观描述与记录。它不仅是一部有着千年历史的游历传记，更是一部有着珍贵价值的历史文献，是中国与古印度、中亚、南亚次大陆、陆海交通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著作，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史和航海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中国与南亚、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汉朝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并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详细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海洋记录。

总之，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将《佛国记》视为瑰宝。印度史学界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留下过这样的赞许：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法显开创了中国西行求法的先例，受其影响，中国西行求法者络绎不绝。

法显是中国对外开放和交流的先驱，是我国第一位旱路跋涉西行求法、海路回国的著名高僧，他不仅历经了陆上丝绸之路，还探索了海上丝绸之路。法显西行求法的成功，在全国掀起了西行求法的热潮，在世界和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以致后来唐代的玄奘大师、义净大师及以后各朝各代的高僧大德步着法显的后尘，一代又一代向西求法。同时，受法显的影响，古印度天竺诸国和西域各国的高僧也纷纷前往中国。隋朝被称为开皇三大士的译经大师、古印度高僧那连提黎耶舍、闍崛多、达摩笈多等大德和被誉为唐朝开元三大士的译经大师善无畏、金刚智、狮子国高僧不空三藏等大师，他们从古印度一路向东，千难万险来到中国弘扬佛法，翻译佛经。丝路沿线国家及海外各国的僧侣和仁人志士也踏着法显的脚印来到中

国和山西学习、交流，对我国的经济、建筑、哲学、翻译、雕塑、美术、音乐、艺术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法显西行求法的成功，对后来中国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中国佛教各宗各派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和山西的开放。法显的西行求法使山西人走出了国门，也将山西和山西文化介绍给世界，使山西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法显是中国杰出的佛学家、旅行家和翻译家，他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山西开放的先驱，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印文化和中斯交流史上彪炳史册。

净土宗的创立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净土宗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最長远的两个宗派。从菩提流支译出世亲的《往生论》，到慧远大师创立往生西方净土的思想；从东亚昙鸾大师创立净土宗，经道绰、善导弘传于中、日、韩、越等地，净土宗长盛不衰。菩提流支、慧远被尊为净土宗初祖，昙鸾、道绰、善导被尊为净土宗三祖师。山西历史悠久、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在山西千年开放的历史上出现了很多著名人物，慧远就是其中一位。

慧远（334—416），俗姓贾，山西雁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从小资质聪慧，好思勤学，13岁时随舅父游学，精通儒学，旁通老庄，厚重的山西文化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听闻道安法师在太行恒山一带弘扬佛法，受影响很大，21岁时他偕同慧持聆听道安法师讲《般若经》，随即大彻大悟，于是发心舍俗出家，皈依道安法师座下，削发为僧修行弘法，法名慧远。他走出山西，在庐山创建东林寺，组织了白莲社，创立了中国净土思想，为中国净土宗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是中国著名高僧。

慧远的师父道安大师被喻为中国佛教的奠基者之一，是两晋时代佛教界的中心人物，对两晋时期佛学的兴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重视戒律，确立僧规，统一僧姓，他撰写的《综理众经目录》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目录，开创了译经目录的先例。他上承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师，下启慧远大师，对我国佛学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堪称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说：佛教有了道安，就像历朝初创时期得到一位擘画国事的宰相，足见道安在中国佛学史上的地位。

东晋太和四年（379），道安前往长安，慧远决定离师前去广州罗浮山弘法，走到江西浔阳（今九江市）时，看到庐山清静妙绝，是理想的弘法宝地，便决心留在庐山建立道场，后创建了东林寺。东晋重臣桓玄非常钦佩慧远，认为他才华横溢、举止得当，是难得的人才，欲请他还俗从政，被慧远婉言谢绝。后来，桓玄下令甄别众僧，却独尊“庐山为道德所居”。慧远的智慧与远虑在于，他非常重视与天竺、西域梵僧大德的交流与往来，礼请他们弘

法、译经、交流。当他听说西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来到关中时，慧远写信与他交流。相传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读到慧远所著《法性论》时，大加赞叹：边国人未有经，使暗与理会，岂不妙哉！东晋时期，虽然佛法不断传入，但仍不全面，慧远亦深感于佛法有缺，遂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赴西域求经，取得梵文本《华严经》三万六千偈及《四分律》，在庐山东林寺设般若台翻译佛经，他还同古印度高僧佛陀耶舍三藏法师一起译出《四分律》。慧远还邀请天竺高僧佛驮跋陀罗来到庐山东林寺译出《达摩多罗禅经》两卷。东林寺成为我国较早翻译佛经的场所之一。慧远的师父道安法师曾请天竺兜佉勒国^[1]高僧昙摩难提法师翻译《阿毗昙心经》，由于昙摩难提对汉文欠通，译本苦涩难解，慧远闻听古印度北天竺国僧人伽提婆法师精通众多经典，便恳请他重新翻译出《阿毗昙心经》四卷及《三法度论》两卷，慧远亲作序言、标目录，赠送给学经的僧众，使这两部佛典得以在全国流传。

晋安帝元兴元年（397），以慧远为首，17位僧人和隐士及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张季硕等123人，在庐山东林寺成立了白莲社，提倡修持弥陀净土法门，精修念佛三昧，期望能够摆脱轮回痛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此慧远被尊为中国净土宗初祖。净土宗是汉传佛教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支，流传至今。

慧远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大智论要略》二十卷（亦名《释论要钞》）、《不敬王者论》一卷、《问大乘中深义十八科（并罗什答）》三卷、《大智论序》一卷、《阿毗昙心序》一卷、《三法度序》一卷、《妙法莲华经序》一卷、《明报应论》一卷、《修行方便禅经序》一卷、《辩心识论》一卷、《法性论》一卷、《沙门祖服法论》一卷、《释三报论》一卷、《佛影赞》一卷等。慧远听说西域罽宾国^[2]高僧弗若多罗大师是专精《十诵律》部的著名学者，曾与鸠摩罗什合译《十诵律》，经未译完弗若多罗大师不幸入灭。慧远对此非常遗憾，后来他听闻以律藏驰名的西域大德昙摩留支来到关中，慧远立刻亲笔致书昙摩留支并派弟子昙邕赴秦相邀，恭请他将未译完的《十诵律》完成，昙摩留支被慧远的诚心所感动，遂将弗若多罗未尽的部分译出。《十诵律》成为我国佛教第一部完整的比丘律藏。道安大师赞叹说：使佛道流布中国的使命，寄托在慧远身上了。

慧远注重佛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与贯通。他从山西来到庐山，在东林寺说法时，为了便于大家理解，经常引用老庄和道家思想来诠释佛性，内容通俗易懂，受到大家的欢迎。他不但是佛学家，还是文学家，他创作的《游石门诗》《游庐山诗》《庐山记略》等诗文，是东晋山水文学的佳作，是了解晋宋之前庐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宝贵资料。他的文辞清丽，

[1] 大月支国，为葱岭西南，乌浒水上游的古国名。

[2] 又称罽宾国、犍宾国、羯宾国，为汉朝之西域古国名。

气势俊雅，在中国山水文学史上产生着悠远的影响。

慧远儒学功底厚重，精通儒家六经，尤其精通《庄子》和《道德经》。他博览群书，精通佛理，将佛学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是中国一代宗师，深受国人和古印度天竺僧人的敬重。慧远大师的净土思想是古印度净土理论在我国弘传的肇始，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被尊为中国净土宗的初祖，深受民众爱戴，东晋、唐、宋诸帝皆感叹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赐慧远“白莲社主”“辨觉大师”“正觉大师”“圆悟大师”等谥号。他创建的东林寺也被誉为净土祖庭。

继慧远之后，昙鸾对净土宗的贡献尤其重要。他被魏孝静帝尊为“神鸾”，被梁武帝誉为“肉身菩萨”。作为佛学大师，他深知佛学需适应社会发展，将儒、释、道三学融于净土思想中。他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有着卓越贡献的佛学大德。

昙鸾（476—542），山西雁门人，从小受到儒学、道学、中医学的熏陶，因家近五台山，受佛学的影响，14岁时就到五台山拜谒文殊。他登山访寻，备见圣迹，向往文殊，誓而出家。他博学经典，学习儒、佛、道各家的著作，尤其对古印度龙树所著、西域鸠摩罗什所译的《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所著的《百论》这四论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将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一位学识渊博的佛学大师。他认为古印度昙无讖翻译的《大乘方等大觉经》词义深奥，难以理解，于是开始为《大乘方等大觉经》作注，后因喉疾，离开五台山，云游各地寻医疗治。他到了汾州时喉疾渐好，想继续写作，但又感叹生命短促，如果不能长年，便难以完成弘法大愿，他听说江南隐士陶弘景学识渊博，医学了得，远近闻名，便前往南方寻访治疗。当时时局混乱，北朝人到南方要经过梁朝官府查问才能通行。昙鸾到达梁都建康时，被官府抓获查问并送交梁武帝。众所周知，武帝好佛，听说他是五台山的僧人，格外重视传旨召见，梁武帝请他来到重云殿与他谈论佛法，被他惊人的记忆和“色空不二”的思想折服，对他礼敬赞叹，将他奉为“肉身菩萨”。

后来昙鸾至庐山求医，又从庐山云游至洛阳，遇到了博通经、律、论三藏的古印度北天竺高僧、佛经翻译家菩提流支。昙鸾向菩提流支请教佛法并询问长生之道，他对菩提流支说：中国有长生不老之书，不知天竺有否？菩提流支传授他《佛说无量寿经》，指出长生不如解脱的深刻佛理，教导他皈依净土，创立净土法门。昙鸾如获至宝，并为菩提流支译出的《往生论》作注。《往生论》是古印度天亲大师注解修学净土法门的心得之著。昙鸾所著的《往生论注》文笔精练，文风朴实，言语清晰简明，虽为文言而不烦琐，教理虽深却不艰涩，譬喻典故引人入胜，佛理阐述深入浅出，文字简约而内涵深邃，辞藻明了而义理清晰，尤其难能可

贵的是他将弥陀本愿力思想体系彻底圆融，完整地继承了古印度龙树、天亲^[1]的理论，并在山西石壁山谷创立净土道场，建立了中国净土宗，使净土法门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传播，净土宗的最大功德就是将原本体系庞大、佛理深奥流传于中国上层社会和士大夫阶层的佛教很快地普及民间。

昙鸾一生致力于净土经典的研究和净土思想的弘扬。北魏孝静帝命他驻锡并州大寺，后移居石壁山谷玄中寺。昙鸾在太原、交城、介休、平遥等山西各地弘传净土教理，教导民众简便易行的念佛方法。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家家弥陀佛，人人观世音”的文化盛况。昙鸾深受社会各阶层的爱戴和敬重，孝静帝亲切地称他为“神鸾”，山西玄中寺因净土念佛法门而名扬天下，成为中国净土宗的祖庭。

隋大业五年（609），太原蒙山开化寺道绰禅师慕昙鸾大名来到玄中寺。道绰（562—645）俗姓卫，并州汶水人。14岁出家，依慧瓚禅师修学经论。他从多方听到、看到昙鸾念佛往生的种种事迹与碑文，极为感动，决心继承昙鸾大师衣钵，弘扬净土法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观想礼拜，精勤不断。为僧众开讲《观无量寿经》时，他语言流畅，辩才无碍，讲经达两百多场。每当他讲经结束时，僧众欢喜赞叹，念佛的声音响彻山谷，吸引着周边各省的僧众纷纷前来。道绰完整地继承了昙鸾的净土思想，他所驻锡的玄中寺当时属西河汶水之地，故后人又把他称为“西河禅师”。

平日里，道绰每天自己念佛号七万遍以上，还广劝僧俗信众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为了统计念佛次数，他便教大家以麻豆等生活常见之物记数，每念佛号一声数麻豆一粒，每日念佛便累积麻豆数百斛，有时念得多时，豆量多达八九十石，念得少的也得二十多石。这样的计数方法在生活中虽简单便捷，却不易记数和携带，到达一定数量后数起来更不方便。道绰为解决此难题，发明了穿木珠计数的方法，解决了大家念佛计数的难题，他还经常把自己穿制的念珠送给四众弟子。这便是中国佛教念珠的起源，它成为僧人念佛的必备品。后来念珠传至民间不断发展，出现了木制、珍珠、翡翠、珊瑚、玛瑙等各种材质的念珠，念珠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在民间成了人们生活中的装饰品，深受大家的喜爱，流传至今。

道绰的著作现存《安乐集》上下两卷，此外日本的《东域传灯目录》就出道绰的《观经玄义》一卷，现已失传。道绰当时德高望重，清人王昶著《金石萃编》（卷八十四）林潆撰载唐“石壁寺铁弥勒像颂碑”中有详细记载。道绰非常重视经证，他在《安乐集》的卷首说：“此所引用的经、律、论、释，多至四十余部，其中常引用的除《无量寿经》《观无量寿

[1] 天亲菩萨，佛入灭后九百年时，出生于北印度犍陀罗国之富娄沙富罗城，婆罗门种族之家的大德。

经》《阿弥陀经》净土三经外，还引用有《大集》《涅槃》《华严》《维摩》《法华》《般若》《大悲》、《增一阿含》《十地》《观佛三昧》《十方随愿往生》《法句》《大乘同》等经，《大智度》《大乘起信》《俱舍》《往生》等论，以及昙鸾《赞阿弥陀佛偈》等”。由此可见道绰的佛学之渊博。道绰的称名念佛、观想念佛及念佛三昧的方法和昙鸾的净土思想一脉相承。道绰大师也是山西开放的先驱之一。

唐贞观十六年（642），29岁的善导法师慕昙鸾、道绰大名来到山西玄中寺，拜道绰为师，弘传净土法脉，他完整地继承了昙鸾、道绰的净土思想，成为中国净土宗的一代大德。

善导大师（613—681），中国佛教净土宗的著名大师，山东人，出生于隋大业九年（613）。他少年出家，听闻山西净土道场玄中寺弘扬净土学说，不辞劳苦前来投奔，唐贞观年间（627—649）拜道绰大师座下，修学念佛法门，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代宗师。673年，善导受唐高宗李治诏请为检校僧，从山西玄中寺来到洛阳，督造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皇后武则天以其脂粉钱两万贯作为资助。此佛像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一处，花费三年零九个月完成，受到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的高度赞扬。善导一生著述颇丰，他为了广度长安信众，写了十万余卷《阿弥陀经》，画净土变相图三百壁，他的留世作品有五部九卷：即《观经四帖疏》四卷、《观念法门》一卷、《法事赞》二卷、《往生礼赞》一卷、《般舟赞》一卷，被僧众奉为金科玉律，崇敬如经。著名高僧印光大师赞叹他：“净业行人之指南针。”

善导大师是中国净土宗的集大成者，他念佛精诚，戒若冰清，严于律己，慈厚待人，道行高深，超凡入圣。他还具有诗歌、音乐、书法、绘画、雕塑多方面卓越的艺术才华，受到世界各国净土信众的尊崇。

在中国佛教史上，净土宗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最长远的宗派之一，从菩提流支译出世亲的《往生论》，到慧远大师创建往生西方净土的思想，从东晋昙鸾大师创立净土宗，经道绰、善导弘传于中、日、韩、越等地，长盛不衰。菩提流支、慧远被尊为净土宗初祖，昙鸾、道绰、善导被尊为“净土宗三祖师”。

中国佛教是朝鲜、韩国、日本佛教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隋唐年间，日本派遣唐使团来访中国，随行有众多的僧侣，他们到达中国后，遍访名山高僧，研习佛法，并将大量佛教经典、佛像法器、礼仪戒律、寺院建筑、文化习俗、医药典籍、诗词书画等带回日本，促进了日本文化的极大发展。山西的五台山和交城玄中寺是他们最向往的圣地，其中净土宗是中国向日本传播文化的典型的代表。

历史上，中国汉传佛教传入日本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山西的五台山传入朝鲜半岛，又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另一条则由中国天台山、东南沿海经海路传入日本。中国净土宗传入

日本先是由典籍的大量传入开始的,日本奈良正仓院的《经书解》有这样的记载:(天平十六年)观经正宗分四卷,沙门善导师撰,七十六纸。日本的天平十六年是我国唐玄宗天宝三年(744),这说明唐朝中国净土宗善导大师的著作已经传入日本。早在平安时代中叶之后,日本贵族与武士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平安城东北的比睿山兴起净土宗,先后出现几位提倡修行净土法门的高僧。以国家层面与学术思想为代表的佛学开始走入民间。日本镰仓时代佛教已经传入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并逐渐地融入日本文化之中。1133年,源空(法然)法师诞生于日本冈山县久米郡南町,是当时担任地方长官的漆间时国之子。他的父母深信佛法,因曾向西方三圣之一的大势至菩萨求子而得子,因此给孩子起名“势至丸”,意为此子乃大势至菩萨送来的。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法然法师。法然20岁时,看到中国唐代净土高僧善导大师撰写的《观无量寿经疏》(又称《观经四帖疏》)时,有感于其中的“散善义”方法,即于日常行住坐卧之时常常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念念不断,便得正定净业。法然法师悟到这便是真正的“解脱之道”,于是,他来到京都东山吉水地区结庵立教,开创了日本净土宗。当时京都地区连年战火,又逢战后饥荒与瘟疫丛生,加之台风侵袭,同时有强盗抢劫杀人等人祸并行,生活困苦,民不聊生。民众听闻法然法师带着解脱之道前来弘法救世,便纷纷前来礼佛参法。从此,中国佛教净土宗在日本广泛传播。

日本佛教净土信众公认的净土祖师有七位,又称“七高祖”或“七高僧”,即古印度龙树、天亲(世亲),中国的昙鸾、道绰、善导,日本的源信、法然七人^[1]。

中国佛教东传与日本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遣唐使团制度。唐朝时,日本僧人和佛教学者被中国的文化和佛教深深吸引着。贞观五年(631),中国接纳了日本派来的第一个遣唐使团。此后,从631年到838年,共有12批日本遣唐使团来到中国学习,他们将中国的历史、文化、法律、宗教、艺术、科技、民俗、中医药等各方面的先进经验,随遣唐使团一起带回本国。日本学问僧、请益僧还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学法,带回日本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绘画、雕刻等,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艺术的发展,并对中日友好交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些学问僧、请益僧把唐代的文化,包括佛教各宗思想先后传回日本。他们中的许多人求学于山西的五台山和玄中寺,后来成为日本佛教各宗各派的开山鼻祖。

长期以来,日本佛教净土宗信众感念中国净土三祖师的恩德,心中对山西玄中寺怀着美好而崇敬之情。1920年日本佛教净土宗常盘大定法师来到中国山西交城石壁山谷中的玄中寺,有诗为证:“石壁山深一径通,幽溪穷处是玄中,鸱啼月蚀空广夜,赞仰鸾绰二祖风。”

[1] 见《佛祖统纪》卷二十六、《乐邦文类》卷三、《净土指归》卷上。

玄中寺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常盘大定法师回到日本后，在日本掀起了瞻仰、朝拜净土祖庭的风潮。玄中寺在近现代再次承担起对外开放和中日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1942年常盘大定法师率领日本佛教代表团来到玄中寺，与中国佛教徒联合举行了纪念昙鸾大师圆寂1400周年及玄中寺奉赞法会。参与这次法会的菅原惠庆长老毕生都在为中日友好而奔波，就在这次法会之后，菅原惠庆怀着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净土祖庭的崇高敬意，从山西玄中寺带了一把红枣回到日本，种植在自己住持的东京运行寺，并把运行寺的寺名改名为枣寺。

1953年初，日本净土大德菅原惠庆念念不忘山西玄中寺，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提出修复山西交城净土宗祖庭玄中寺的建议。3年后的1956年秋，国家修复玄中寺的二期工程顺利竣工，中国佛教协会致函全日本佛教会，邀请日本僧众来华参加玄中寺的修复庆典法会。1957年9月沉默了多年的净土古刹玄中寺殿宇辉煌，佛像庄严，以全日本佛教会会长高阶珑仙为团长，以菅原惠庆、竹村教智和本善隆为副团长的日本佛教友好使节访华团一行16人，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周叔迦居士等的陪同下，同玄中寺僧众一起举行了庆祝净土古刹修复庆典暨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像开光大法会。净土古刹玄中寺谱写出中日友好的历史新篇章，彰显出其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而这次佛教文化交流大会的盛大举行，对于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交流的坚冰，改善日本政坛对中国的一贯政策，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赵朴初先生非常重视山西玄中寺的重要地位。早在1955年8月他访问日本时，就拜访了日本运行寺，并为菅原长老题词：“念佛法门，玄中一脉。东土西方，微尘不隔。”菅原长老对祖庭无比虔诚。1957年的这次法会，菅原惠庆长老带来一根枣木禅杖，赠予当时玄中寺住持象离法师。这根禅杖就是用他之前从玄中寺带回的枣子，在运行寺长成的枣树上取下的枝干而做成的，禅杖顶端雕刻佛像，杖身刻有“日中一心，万善同归”八个字。这根禅杖由粗细两枝组成，粗枝代表玄中祖庭，细枝代表日本枣寺，至今仍供在玄中寺祖师殿内，体现了“玄中一脉”的精神。菅原惠庆还怀着对祖庭的无比敬仰之情撰写完成了《玄中寺与昙鸾大师》一书。为了纪念玄中寺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中的历史作用，菅原惠庆将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分别取名为菅原玄子、菅原中子和菅原寺，借此表达对净土祖庭玄中寺深厚的敬意。

赵朴初先生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玄中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1979年，菅原惠庆长老在日本创办了《玄中一脉》杂志，并以赵老的亲笔题词作为杂志封面。此杂志面世后，在中日佛教界受到追捧与赞扬，菅原惠庆特意将创刊号留存并寄与赵朴老。

1982年菅原惠庆长老入寂。次年3月，其子遵长老遗嘱将其骨灰送到祖庭玄中寺安奉，赵朴初会长专程陪同前来，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根通法师等陪同参加，在玄中寺举行了安放仪式。赵朴初会长为墓塔题写了“日本国菅原惠庆长老之墓塔”的塔名和碑铭，

菅原惠庆的一生都致力于弘传净土法门，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喊，他以实际行动印证了“玄中一脉”的真谛，以永不懈怠的精神使中华文化与佛法义理在现代日本得到继续发扬光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日本最早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除菅原惠庆外，还有大谷莹润等佛教友人，他们是日本净土宗的信徒。1953年1月，在日中友好协会的倡议下，日本宗教界人士成立了“中国在日殉难者慰灵执行委员会”，大谷莹润担任此会的委员长。他先后9次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死难的中国劳工的遗骨送还中国。新世纪到来后，千年净土古刹陆续迎来了很多日本佛教界的参拜团员，其中2000年，玄中寺举行了大谷莹润显彰碑落成法会，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刀述仁、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杨同祥、山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周新玉、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玄中寺方丈根通大和尚等一同参加了法会。刀述仁副会长在法会致辞中回顾了大谷莹润长老在日本发起“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和送还中国劳工遗骨的义举，向与会的各位僧众展示了当年大西良庆长老等在日本街头募集“日中不战之誓”签名运动的签名簿，对大谷莹润为中日两国友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赞赏与肯定。参加法会的日本代表团团长、真宗大谷派宗务总长木越树对日本在对华战争期间的侵略行径深感愧疚，他代表日本佛教界宣读了《表白文》：“我们对过去的罪责深感愧疚。今后将以大谷莹润师为榜样，以贵国的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自诫，正确认识历史，决不重蹈覆辙。我们将遵循以昙鸾、道绰、善导三祖师为首的净土七高僧传承弘扬下来的本愿念佛的教诲，超越国家、民族、语言、思想的差异，与全世界人民携手，沿着真正的和平友好大道坚定不移地大步前进。”

吕梁山的草黄了又绿，石壁山谷的花谢了又开，玄中寺的钟声日日在山谷中回荡，净土宗历经了一千五百多年传承，玄中寺也已经超越宗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及山西对外开放和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